

美国研究视阈中的三 K 党运动

——以“中层结构”和“社会空间”理论为视点的论析*

李国庆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从美国研究的“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看,美国三 K 党组织作为一种“中层结构”破坏了美国社会文化正常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空间”。三 K 党运动的演进过程是中层机制的消极构成在“社会空间”中的病态表征,彰显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深层矛盾,成为美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悖论。

关键词:美国研究;中层结构;社会空间;三 K 党运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1-0147-05

作者简介:李国庆,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美国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美国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跨学科性。从美国研究的视角来审视三 K 党运动有两个重要的切入点:美国研究的“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把“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定会深化美国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社会文化内在的结构规律。作为“中层结构”之一的美国三 K 党组织在美国历史上的演进导致“破损的社会空间”的形成,三 K 党运动的演进过程是“中层结构”消极组成部分的病态表征。把美国研究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三 K 党运动无疑会深化单一传统学科对该运动所做的研究。

一、“中层结构”理论

美国研究最初发端于历史学和文学的综合。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为美国研究的奠基时期,50、60 年代迅猛发展,进入本世纪已牢牢确立其学术地位。^[1]美国研究主要考察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文化层面。它吸纳各个传统学

科的合理成分,并从新的视野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并尽可能多地顾及文化的方方面面。^{[2](P338)}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与社会学新的综合趋势。

“中层结构”理论便是美国研究学科综合的产物。“中层结构”概念的思想基础是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的社会文化构成理论。“中层结构”概念在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和理查德·涅高兹(Richard Neuhaus)的合著《权力下放:中层结构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中得以详细阐释,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探讨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层结构”是介乎于个人生活(微观构成)和社会(宏观构成)之间具有共同性的结构,^{[3](P2)}该书中的“中层结构”具体指涉邻里、家庭、教堂和志愿组织等。^{[4](P2)}自此,中层结构被学术界广泛应用,其外延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大,例如当代美国研究把大众传媒等机制都纳入到“中层结构”范畴。美国研究“中层结构”的代表性人物当属杰·米奇林(Jay

* 收稿日期:2009-12-06

Mechling)。他对社区所做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层结构理论的。^①

美国研究“中层结构”理论的提出为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美国学术界从积极意义出发研究“中层结构”及其影响,肯定了“中层结构”在稳定和维系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外部环境和内部消极因素对“中层结构”正常演进带来的冲击,促使其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5](P42)}美国“中层结构”内部构成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变动性导致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极端与排他,致使社会大结构中的成分互相排斥,而私人生活则呈现病态特征。可见,“中层结构”的异化对美国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文化构成产生裂变。因此,“中层结构”作为美国文化构成的主要动因之一值得我们去批判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中层结构”是美国社会文化规律和构成并解决现代社会生活异化和变态的关键。^{[6](P30)}美国历史与文化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病态表征会通过“中层结构”的具体阐释得到最明晰的体现。

“中层结构”既包含积极意义上也包含消极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消极意义上的代表性组织当属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美国三 K 党组织(Ku Klux Klan)。美国三 K 党是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极端社团组织。彼得·伯杰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三 K 党是一种“中层结构”。伯杰认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动态性。动态性会破坏中层结构的稳定性,从而导致社会的反常状态,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危害性。这种对自由的威胁正是来自中层结构的损坏。没有稳定的中介机制运作,社会政治秩序就会受到影响,不能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发展。^{[7](P107-109)}美国三 K 党组织开始组建于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最初的组织形式只是一个由南部同盟退伍军人组成的志愿组织。作为中介机制的建构之一,该组织受到当时社会变迁的冲击,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极端分子的加入使得该组织的性质从最初的志愿组织逐步演变成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团体。三 K 党组织的成员大多代表着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极端保守群体,他们缺乏应变的能力,对社会巨变无所适从,陷入到经济的困窘和精神上的绝望,想通过加入极端组织寻求慰藉。他们的加入使得社团组织的极端思想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给美国社会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所以,把三 K 党组织作为一种代表性的“中层结构”来做具体分析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二、“社会空间”理论

要进一步探求和发展美国研究的“中层结构”理论,深入挖掘“中层结构”的具体运作成为一个主要课题。除了对社区进行具体考察之外,米奇林对“中层结构”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指出“中层结构”和“空间”概念结合的可能性,并引进了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菲利普·费舍尔(Philip Fisher)对这一结合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在其《新美国

研究》(The New American Studies)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理论。在此有必要对“社会空间”理论提出的背景和该理论的内涵做一简要介绍。

“社会空间”理论的出现是美国研究“空间转向”的产物。美国研究的“空间转向”综合了各个学科对“空间问题”的最新发展。“空间转向”是近年来各个学科讨论的一个热点,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理论方法的拓展、重组和修正。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静止的和非辩证的,被局限于社会行动狭窄的环境或舞台。近年来,各个学科的学者都注意到了“空间性”或“空间问题”的凸显,空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理范畴,发展成为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被赋予了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意义。其核心不但强调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更重视抽象意义上的空间。美国研究吸收了各个学科有关“空间转向”的研究成果,并形成自身独特的“社会空间”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自身的空间逻辑和运作机制,涵盖了更加广阔的地理界线、话语场域和叙事空间,达到了“空间文化”的重构。美国研究的“空间转向”不仅牵涉到具体空间的生产,更关涉到隐喻空间上的政治和文化维度,例如个人身份认同的失落与重建的问题,这也是后现代的空间理论所关心的问题。因此,美国研究更加关注隐喻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为个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阐释的平台。

美国研究“空间转向”的代表性人物首推菲利普·费舍尔,他对空间进行了更加细化的阐述。费舍尔在他主编的《新美国研究》一书中,大体上奠定了美国研究“空间转向”的基调,指出美国研究的空间没有局限性,没有逻辑上的限制,而具有政治表征的观念。^{[8](P74)}费舍尔随即提出了“民主的社会空间”(Democratic Social Space)和“破损的社会空间”(Damaged Social Space)两种概念。^{[8](P85)}“民主的社会空间”的主要特点是同一性和流动性,通过空间的自由流动达到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8](P172)}“破损的社会空间”的特点是对抗和分割。“破损的社会空间”就是分离或变更公民共有的或民主的统一价值观,并抵制民主社会空间,经常处于民族和统一民族身份的对立面,尽可能反对空间转变和社会变迁,认为变动和任何对变动的诉求都是一种背信弃义、缺失和否定。^{[8](P160)}民主的社会空间与破损的民主空间内的纷争是美国文化冲突的主题之一。两种空间的长期存在和强烈抗始始终主导着美国多元文化冲突的深层矛盾,成为美国文化史一个特有的悖论。

三 K 党运动的演进阻碍了美国社会空间的自由流变,三 K 党组织的长期存在无疑会对“民主的社会空间”形成冲

^① 在罗伊主编的《后国家主义美国学》(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一书中,米奇林的研究基于两个视角。其一是“中介结构”怎样把个体(私人的,个性的价值观)引入到多元公共空间。其二是“中介机构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参见 Jay Mechling,“Rethinking the Civil Religion in 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 in Post 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69.

击,使得美国社会空间掺杂了极端和变态的因素,扭曲了社会空间的正常发展,导致“破损的社会空间”的产生。而鉴于“中层结构”是社会空间中主要的运行机制之一,社会空间的破损无形当中又会致使“中层结构”及其延展体系异化与裂变。这种恶性循环使得美国社会与文化偏离正常的发展方向。“破损的社会空间”影响到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健康和稳定的发展,给美国社会和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三 K 党组织作为“中层结构”的组成部分,连接着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微观范畴和宏观范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三 K 党组织导致社会空间的异化发展,导致“破损的社会空间”的产生。同时,“破损的社会空间”又会给“中层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带来破坏,三 K 党运动所带来的危害就会转嫁到美国社区、学校、家庭、大众传媒等中介机制。把“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结合起来必定会深化美国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规律和极端构成。

三、三 K 党运动的病态表征

美国学术界对三 K 党运动的解释和研究大多采用单纯的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跨学科视角的探讨还不够系统,尤其是还没有从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这种跨学科性的研究视角对三 K 党运动做过系统的阐释。美国三 K 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层结构”阻碍社会空间正常演进的表现形式之一。综合“中层结构”和“社会空间”理论来解读三 K 党运动是通过美国研究视野来阐释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途径,开拓了三 K 党运动学术研究的新视角。

按照费舍尔的观点,“破损的社会空间”具有一定的政治压力,迫使每个个体放弃多元化的身份认同,^{[8](P161)}并受到极端认知的侵害。对美国社会来说,三 K 党组织对抗“民主的社会空间”的正常发展,阻挠社会进步,促使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偏离统一进步的文化取向促成病态成分残留在美国文化史之中。三 K 党组织在美国社会空间上的非正常演进无疑会影响美国社会的文化取向和美国人的国民性格。而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中层机制的组成成分异化,导致中层机制的极端构成在社会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冲突范式和病态表征。费舍尔在重新审视美国文化史的时候,充分考察了空间同一性和空间分割的学术论争,指出美国文化多元性和异质性使得社会空间处于一种矛盾的、不稳定的状态,并在不同时期衍生出不同表征。^{[8](P88)}笔者认为,尽管种族主义贯穿于三 K 党运动的始终,但是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演进和社会文化构成,三 K 党组织所鼓吹的极端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区域、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弱势群体、亚文化等领域的矛盾和冲突范式。

美国的三 K 党组织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形成一种极端的社会运动,并在不同时期产生出不同的病态表征。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从该组织成立肇始,共经历三次连续

的三 K 党运动。第一次三 K 党运动开始于 1866 年,肆虐于美国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其目标是在美国南部恢复民主党的势力,并反对由联邦军队在南方强制实行的改善旧有黑人奴隶待遇的政策。他们主要的仇视对象是黑人群体和共和党成员。第二次三 K 党运动开始于 1915 年,在 20 年代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三 K 党运动的仇视对象主要是外来移民,尤其是其中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等群体。第三次三 K 党运动始于二战结束,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三 K 党兴起的最主要动力来源于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反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身份诉求,其仇视的对象为黑人、美国西裔群体、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

第一次三 K 党运动主要体现了社会空间中的区域与种族冲突范式。第一次三 K 党运动发端于美国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促使区域与种族两种冲突范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空间的区域冲突被费舍尔称之为“地理的区域主义”。^{[8](P161)}美国研究学者迈克尔·斯坦纳(Michael Steiner)认为,区域主义对抗是美国历史与社会文化深层次矛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美国研究区域主义概念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生活的焦虑和社会逆流的产生根源,更好地理解美国文化中的二元对立。^[9]美国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区域分歧与冲突曾经长期占据着美国社会与文化史。美国南部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种族压迫、对州权原则的坚持构成美国南部独特的社会机制,这一传统影响深远。研究三 K 党的权威人士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强调三 K 党为美国南部民间神化之一,南部为三 K 党的存在提供了沃土。^{[10](P128)}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南部诸州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种族结构变迁,区域对抗和种族仇恨凸显。南部的战败使得代表南部传统的种植园经济体系瓦解,被北部的新兴工业体系所代替。之前占主导优势的南部白人群众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出现的变化极为不满,其极端代表企图通过加入三 K 党组织来破坏进步的经济体系,梦想回到落后的种植园经济体系。^[11]

经济对峙、区域对抗和种族仇恨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派纷争提供了温床。由于代表北方共和党利益的国会通过了实现种族平等的法令,因此南方白人的代表民主党无法通过立法来维持白人一直以来的地位。除此之外,三 K 党组织也希望能够控制被解放黑奴的政治和社会话语权为其所用。暴力成为了三 K 党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以此来对抗代表北方利益的政府。许多南方人相信,当地黑人正是受了这些北方人的教唆鼓动才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他们采用恐吓、暗杀和私刑等手段残酷迫害黑人,南部民主党人和自由民局人,破坏了正常的民主选举过程。由此,三 K 党成了南部民主党的暴力工具,在南卡和北卡州 18 个月之内三 K 党就制造了 187 起谋杀案和 548 起恐吓案。^{[12](P674-675)}总之,三 K 党从最初的志愿组织沦为具有极端性质的恐怖组织表明:一旦“中层结构”异化现象出现,

就会给社会和民众构成了巨大的危害。

第二次三 K 党运动跨出南部区域成为一种全国性思潮,主要体现了社会空间中的民族与阶级冲突范式。从 1870 年到 1914 年美国政府对外国移民采取开放政策,大批移民蜂拥而至,^{[8](P70)}各国移民在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引发了对国外移民普遍的仇视情绪。而这期间大量外国移民涌入美国,他们的首选地点是美国城市,每个城市都充斥着来自各个国家移民的聚居区。在美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阶级对峙的心理进一步加剧,代表乡村和小城镇价值观的旧中产阶级与代表城市生活方式的新中产阶级矛盾重重。^[13]美国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使得对外来移民的仇恨进一步加剧。民族仇视和阶级对峙的矛盾在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当时他们大多居住于乡村和小城镇,社会的转型和阶级结构的变迁使得他们丧失传统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极端保守分子通过加入三 K 党组织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一时期的三 K 党成员大多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中的极端分子。他们仇视和迫害外国移民,引发了新一轮的本土主义运动;他们极力反对社会现代化,将“反城市”的蛊惑加入其新的诉求之中,并引发了一系列破坏性事件。

第二次三 K 党运动是历次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的,在运动的巅峰时期成员数量多达 300 万到 600 万。^[14]三 K 党组织力量逐渐壮大,开始推选代表三 K 党等极端群体利益的候选人,渗透到政治选举体系,干扰社会机制的正常运作。^[15]致使其在各州的政治体制中都占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联邦政府中也有一定的影响,1924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甚至被三 K 党组织所操纵。三 K 党成员对外国移民的排斥和仇视阻碍了外国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试图否定外国移民在美国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中的贡献,引发美国本土的民族仇恨思潮盛极一时。同时,三 K 党组织操纵美国政治机制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转型,延缓了美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促成了民主社会空间的破裂,导致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第三次三 K 党运动主要体现了社会空间中的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冲突范式。二战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运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身份诉求对当时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宣扬的“家庭价值”、“性别角色”和种族主义文化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对主流右派的传统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也形成了冲击。

以 1964 年“民权法案”和“肯定性行动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的联邦法规实施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经济地位得到了一定提高。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经济政策的调整 and 种族关系的变迁致使主流右派的部分白人保守群体丧失了优势的经济地位,其中部分人便蜕变为极端右翼群体,该群体成为这一时期三 K 党组织活跃的动力来源,^[16]这一时期的三 K 党运动对少数族裔和同性恋等弱势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进行了极力地反抗,仇恨对象集中在以黑人和西裔美国人为主的少数族裔、女权

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这一时期三 K 党对黑人的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黑人社区、教堂和混合学校等中介机制,妄图干扰黑人群体的社会参与和族裔诉求;三 K 党主要领导人大卫·杜克(David Duke)把反对女权作为宣扬三 K 党运动的一个主要着眼点;^[17]三 K 党成员对同性恋群体纳入到仇恨对象之中,开展了多次的反同性恋运动,例如 1984 年 6 月 9 日,55 名三 K 党成员游行反对同性恋群体。^[18]第三次三 K 党运动时期,暴力仍然是该组织的主要手段,^[19]并引发了新一轮的仇恨犯罪,导致犯罪的起因大多是由于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和对弱势群体的偏见。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手段成为三 K 党组织的惯用伎俩。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三 K 党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从 1954 年 1 月到 1963 年 6 月,三 K 党在美国南部制造了 163 起针对黑人的住宅、教堂与混合学校的爆炸事件。^[20]一系列事实证明:三 K 党运动破坏了维护民主社会空间生成的中介机制正常运行,对美国社会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三 K 党运动对社会空间和中介机制的破坏更具有隐蔽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该运动对“中层结构”中的大众传媒机制的隐形破坏并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异化。为了更加有效地迷惑民众,这一时期三 K 党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革新了该组织的宣传方略,不遗余力地利用美国当代大众传媒来宣传和标榜自己,并完成了由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的转变。由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密切关系,这种大众传媒方略直接影响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变异,导致美国当代大众文化掺杂着三 K 党所宣扬的以白人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消极成分,致使美国社会与文化的重构与异化。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深受此种文化理念和认知的麻痹与毒害;美国当代社会种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白人至上主义运动持续、仇恨犯罪率的提升、暴力文化形式的盛行等现象便是例证。第三次三 K 党运动的大众传媒方略以及大众文化异化极具隐蔽性,由此导致的危害亦不容低估。

四、结语

美国研究中层机制中病态组织的存在促成了社会空间的分化。“破损的社会空间”反对“民主的社会空间”的同性和自由流动性,鼓吹分割和对抗,冲突与仇恨成了“破损的社会空间”固有的特性。美国研究不仅探讨美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更注重在多种族、多元文化和冲突矛盾中寻求和促成统一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的形成。从美国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讨美国病态文化是可行和必要的。“民主的社会空间”转换的主要因子就是流行性,而且是自由的、透明的流动。为了能实现社会与文化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途径之一就是由“破损的社会空间”到“民主的社会空间”的转化。任何阻碍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转化都会阻碍社会和文化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有中. 美国的美国研究[J]. 美国研究, 2006(1).

- [2] Henry Nash Smith.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J]. *American Quarterly*, 1957, 9(2).
- [3] Peter L. Berger,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7.
- [4] Charles Peguy. Democracy and Mediating Structures: A Theological Inquiry [M].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0.
- [5] William Bentley Ball. Mediating Structures and Constitutional Liberty[J]. *Worldview*, 1978, 21(9).
- [6] 滑明达. 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7] James Davison Hunter, Stephen C. Ainlay, Making Sense of Modern Times; Peter L. Berger and the Vision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Routledge, 1986.
- [8] Philip Fisher.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 Essays from Representation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9] Michael Steiner. Regionalism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83, 73(4).
- [10] David Chalmers. Hooded Americanism: The History of the Ku Klux Klan[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1] Michael W. Fitzgerald. The Ku Klux Klan: Property Crime and the Plantation System in Reconstruction Alabama[J]. *Agricultural History*, 1997, 71(2).
- [12] 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 - 1880[M]. The Free Press, 1998.
- [13]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M]. Hill and Wang, 1966.
- [14] Rory McVeigh. Power Devaluation, the Ku Klux Klan, and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24[J]. *Sociological Forum*, 2001, 16(1).
- [15] Kenneth Wald. The Visible Empire: The Ku Klux Klan as an Electoral Movement[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0, 11(2).
- [16] Rory McVeigh. Structured Ignorance and Organized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al Forces*, 2004, 82(3).
- [17] Nancy K.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James L. Gibson. Homosexuals and the Ku Klux Klan: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Tolerance[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87, 40(3).
- [19] David Chalmers. Backfire: How the Ku Klux Klan Help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J].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20] John George and Laird Wilcox. Nazis, Communists, Klansmen, and Others on the Fringe: Political Extremism in America[J]. Prometheus Books, 1992.

(责任编辑:陈伟)

On the Ku Klux Klan Movement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American Studi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Mediating Structure and Social Space

LI Guo-qing

(College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Mediating Structure and Social Space, Ku Klux Klan, as a mediating structure, has violated the social space on which normal American culture relies. The process of Ku Klux Klan movement is a sick presentation of the negatively-structured mediating mechanism in social space. It reveals the deep antinomy in the multiple American cultures, and is a specific paradox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American studies; mediating structure; social space; Ku Klux Klan movement